

崇文学朮文库

# 历史文献学论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编



本书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建立二十周年纪念专集。

二十年来，该所以刚健笃实的精神，  
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成就斐然。

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前进的足迹，  
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研究实力。

展望未来，他们决心继续

举张舜徽先生旗帜，作文献学研究文章，  
在历史文献学及传统文化诸领域  
取得更大成绩。

崇文书局



崇文学朮文库

# 历史文献学论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编

周国林 刘韶军 主编

崇文书局

(鄂)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文献学论集/周国林, 刘韶军主编. —武汉: 崇文书局, 2003.9  
(崇文学术文库)

ISBN 7-5403-0651-3

I. 历… II. ①周…②刘… III. 史籍—文献学—文集 IV. G257.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7359 号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武昌黄鹄路 75 号 430077)

印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43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750 千字

印数: 0001 - 2000 册

定价: 60.00 元

# 目 录

## 刚健笃实 博通致远

- 写在历史文献研究所建所 20 周年之际…………… 李国祥 周国林(1)
- 整理古籍与辨伪考信…………… 吴量恺(8)
- 关于文献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顾志华(17)
- 张舜徽与梁、钱鼎足而三的清学史研究
- 评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赵吉惠(27)
- 张舜徽先生的文献学成就…………… 王余光(47)
- 张舜徽史学的总结性特征…………… 徐 梓(57)
- 考据学的回顾与前瞻…………… 杨 昶(68)
- 汉字、文献与数码信息…………… 陈蔚松(103)
- 汉字发生的社会基础…………… 王作新(133)
- 中国传统文本诠释模式论略…………… 王勋敏(143)
- 《六经》次序及其有关问题…………… 周国林(149)
- 《春秋左传注》献疑…………… 鲁 毅(162)
- 《越绝书》散论…………… 仓修良(171)
- 汉初儒道之争中的儒家…………… 熊铁基(181)
- 《孝经》整理研究史论略…………… 王玉德(184)
- 《汉书》杨雄本传中年诸事考…………… 刘韶军(201)
- 傅玄学术思想考述…………… 李晓明(228)
- 论成玄英的庄学思想…………… 董恩林(269)
- 《贞观政要》的编纂及进献时间考…………… 雷绍锋(281)
- 范成大著述的历史文献价值…………… 王瑞明(286)
- 论陈景元的《庄子》研究…………… 刘固盛(291)

- 《道藏》戒律文献及其精神述略…………… 伍成泉(301)
- 《读史方輿纪要》稿本研究…………… 施和金(319)
- 论焦竑的《老子翼》及其老学思想…………… 韦东超(337)
- 焦循《孟子正义》学术思想成就述评…………… 赵庆伟(353)
- 经学的终结与经学研究的复兴…………… 姚伟钧(375)
- 20世纪早期老子年代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刘筱红(397)
- 胡适与《章实斋年谱》…………… 刘重来(407)
- 远古传说的早期传播及史学价值考论…………… 陈 虎(417)
- 周初所建三监考论…………… 冯浩菲(433)
- 城邑文明与春秋时代…………… 傅道彬(440)
- “厚葬”与“节葬”的冲突  
——儒墨两家丧葬观比较…………… 贾国伟(461)
- 新出竹简与古代法律思想史研究…………… 崔永东(477)
- 两汉时期蝗灾探析…………… 陈业新(487)
- 魏晋玄学与长江文化…………… 马良怀(496)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通史撰述…………… 朱华忠(516)
- 北朝礼制建设与宗庙祭礼…………… 柏贵喜(522)
- 东晋刘昌宗音切的韵母系统…………… 范新幹(533)
- 《兰亭诗》、《序》的思想底蕴及文学价值…………… 徐 华(542)
- “破昏殆法”研究  
——现存最早的劝世“药方”…………… 王继如(556)
- 《直斋书录解题》与宋代出版史…………… 张 积(569)
- 两宋时期的书业广告…………… 范 军(596)
- 明清地方税费征收与管理体制研究…………… 吴 琦 匡小焯 赵秀丽(606)
- 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 谢贵安(640)
- 试论明清易代与士人风气…………… 赖玉芹(652)
- 论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之关系…………… 张三夕(664)
- 考据非为稻粱谋…………… 郭康松(676)
- 《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域·集团·网络与  
社会秩序》序言…………… 熊远报(683)

# 刚健笃实 博通致远

——写在历史文献研究所建所 20 周年之际

李国祥 周国林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在华中师范大学庆祝百年华诞之际，历史文献研究所也将纪念建所 20 周年。在喜庆之日，回顾历史文献研究所 20 年来走过的历程，总结各方面的工作和成果，据以确立新的奋斗目标，是很有意义的。

—

历史文献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献所)的建立,有其必然性。首先,它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是中国社会的大转折时期。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带动了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学术界在多年的沉寂、荒废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逐渐展开,并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81 年 7 月,陈云同志在接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给他的信之后,就古籍整理作了重要指示,强调“整理古籍是一项很重大的工作,工作量很大,关系到子孙后代”。提出要下决心,搞个领导班子,搞个规划。第一个十年先把基础打好,把愿意搞的人组织起来,第二个十年也要有一班人接上去,第三个十年再接上去,发展壮大。当年 9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作了七点指示。其中指出:“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中央文件和陈云同志的指示,为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教育部高教一司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一系列准备工作就绪后,1983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5 日,召开“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具体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一批后来直属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的古籍所,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建立的。

文献所的建立,也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发展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就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工作。1953年,历史系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设置,开设“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程,张舜徽先生草创其事,担任主讲,并撰著出版了适合师范院校历史系使用的课程教材《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在全国师范院校中率先确定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计划。在教学之余,他勤于治学,以小学、经学为基石,以理群书。中年以后,于四部各有所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有《史学三书平议》;创立新体,有《中华人民通史》。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有《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如此多的创获,并世学者中实不多见。在他的周围,不仅有崔曙庭、李国祥两位得力助手,还聚合了王瑞明、吴量恺、熊铁基等一批教学科研骨干。凭着这样的实力基础,教育部考虑在全国高校中设立古籍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便顺理成章地入选,成为全国最早设立古籍研究所的十多个单位之一。教育部批准建所的时间,是1983年4月2日。华中师范大学正式宣布建所,是1983年5月3日。

建所之初,张舜徽先生担任所长。他对文献所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发展方向,有明确的规划。就古籍整理而言,他特别强调整理与研究的结合。1983年3月,在教育部召开的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古籍整理和文科改革》的讲话,赞同李一氓同志整理古籍包括总结性论著的观点,认为古籍整理的方法和门径,应该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他这些认识,对文献所的教师和学生影响很大。当时,张先生已年逾七旬。所内具体事务,主要由副所长李国祥同志承担。当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受教育部的委托,举办历史文献学讲习班。来自全国高校的26名中青年教师,在这里系统地接受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培训,时间半年。也有一些外地教师,自动延期到一年。除张先生主讲外,还聘请了萧蓬夫、周大璞、赵俪生、来新夏、刘乃和、仓修良、施丁、李格非、朱祖延、夏渌、胡国瑞、冯天瑜、童恩翼等一批著名学者到讲习班讲学,后来结集为一部高质量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演讲集》。全身心的投入,使讲习班中不少人成为文献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像赵世超、李成良、刘重来、杨绪敏、张林川、张玉勤、白新良等人,都在这个讲习班培训过半年。对于这个讲习班的成绩,古委会负责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建所之初这种齐心协力、刻苦务实的工作作风,几十年中一直延续下来。业务上,文献所隶属于教育部古委会,各种经费也得到古委会长期而稳定的资助,这是文献所以得以发展壮大的一個基本条件。因此,对于古委会交给文献所的工作,全所上下都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1986年,古委会组织各地学者编纂《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整套丛书135种,文献所便承担了6种。1987年10月,还承办了一次编委会的审稿会议。古委会主任周林同志亲自与会,各古籍所负责人和著名学者到了不少。时任古委会秘书长的安平秋先生,后来在回忆丛书编纂始末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一文中,有《从柳浪闻莺到桂子山上》一节,提到这次审稿会,有如下的描述:“会议结束正逢中秋节,华中师大的专家楼坐落在武昌桂子山上。入夜,桂子山上举行赏月茶会,几张方桌,围坐着全体编委和特邀到会专家。天上明月如盘,清辉洒地,眼前桂树葱茏,桂花飘香,华中师大古籍研究所的青年活跃席间,引得王达津先生即席赋诗,刘乃和先生清唱京戏。这气氛预示着《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克服了当前的困难,第一批50种书稿有如母腹中的胎儿,快要降世了。”字里行间,不无对华中师大古籍所组织工作的肯定。

20世纪90年代,古委会组织人力开展二十四史全译工作,其间有过停顿。起初,文献所没有承担具体任务。1998年,当出版形势好转之后,这项工作再度提了出来。在几个古籍所已经交稿的情况下,古委会秘书长杨忠先生将《北史》、《魏书》的全译任务交付我所,限期一年交稿。两书都超过100万字的篇幅,完成起来困难不小。但全所对这项紧急任务,没有丝毫畏惧的感觉,想到的只是古委会对我所的信任。一年之后,终于以较高的质量交稿,显示出文献所在史学方面的优势。随后,还对其他单位南朝五史中若干篇章达不到质量要求的译稿,给予了协助。

2001年冬,所内董恩林等同事有感于几年前参加中青年学术研讨会的收获,提议文献所承办一次这样的会议。为此,我们赴古委会主动请缨,得到批准。经过半年的周密筹备,“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7月在武汉召开。古委会主任安平秋先生、秘书长杨忠先生亲自前来主持。到会的外地兄弟古籍所中青年学者共70多人。另外,还特邀了著名学者章培恒先生、宗福邦先生与会,为大会作报告。会议的主题是新世纪古籍整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另一个内容是古籍整理中做学问与做人相统一的问题。会议开了四天,讨论热烈而认真,与会者感到收获不小。分发给与会代表的会议文件中,有文献所近期出版的《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等著作六部,这对文献所的研究实力,是很好的展示。通过这次会议,文献所同古委会的联系更为紧密,同



各兄弟所的交流更为广泛,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

20年来,文献所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有一些变化。1990年,张舜徽先生改任名誉所长(直至1992年逝世)。李国祥先生担任所长,副所长为陈蔚松、顾志华两位同志。三人的工作,一直到1995年底。1996年初,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文献所和原历史研究所、历史系合并为历史文化学院。文献所所长由周国林担任,副所长为刘韶军同志,1999年,在刘韶军同志出国进修后,董恩林同志任副所长。2003年初,增补刘韶军同志为常务副所长,加强了所内的领导。人员方面,进进出出是常事,但不拘一格吸纳人才,是文献所的一个基本思路。建所之初,老学者周学根先生从中文学科调至文献所,王昌茂先生从外单位调至文献所,顾志华同志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1981年就分配到文献所,成为研究所较早的成员。短短几年之间,研究所人员就达到20多人。在院系调整后,人数有所减少,保持在15人左右,具有教授、副教授职称者,占绝大多数,基本力量是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文献所的工作,便是依靠这些人共同干出来的,包括目前已退休的崔曙庭、王瑞明、吴量恺等先生和已调离文献所的王昌茂、马良怀、李长弓、张三夕、蔡宇、熊远报、王武子、高华平等诸位同志。

## 二

文献所除了大量的日常事务,基本工作就是教学和科研。回顾这两方面的工作和成绩,应该说是很出色的。

教学工作,主要是面向研究生。1979年,历史文献学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生。198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核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为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全国高校中可以授予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的,仅此一家。1982年冬,开始招收博士生。到2003年,硕士生共招收20届,86人;博士生共招收15届,62人。

研究生培养中,确定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至关重要。从张舜徽先生招收首届研究生开始,一直非常重视文献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历史学基本素养的提高。他自己是走博通之路取得成功的,也希望自己的学生学术视野要开阔,治学气象要博大,不要钻进一些狭窄的问题中出不来。他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启发很大,大家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取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成果自然就可观。其中如张三夕同志的《史通》研究、冯浩菲同志的《毛诗》训诂研究、刘韶军同志的《太玄》研究、赵丽明同志的清代《说文》学史研究、傅道彬同志的《诗》外诗研究、王继如同志的《汉书》研究,在一二十年后看来,仍是高水准的博士学位论文。这

种治学风格,在熊铁基、李国祥等先生指导博士生时仍然保持下来,不断出现一些填补空白、开拓新境界的毕业论文。如刘固盛同志的《宋元老学研究》、陈业新同志的《汉代灾异研究》,都是得到专家好评的上乘之作。

从文献所毕业的研究生,目前不少人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还产生了较大影响。数年前,张舜徽先生的第二届博士生冯浩菲同志在山东大学牵头申报古典文献学博士点,获得成功,为该校中文学科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通过增添了力量。第三届博士生傅道彬同志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牵头申报古代文学博士点,一举成功,使该校博士点从无到有,取得零的突破。在外校工作的毕业生,目前已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朱庆之同志、信管系的王余光同志,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施和金同志,苏州大学人文学院的王继如同志。也有少量的毕业生,在其他领域工作,同样做出了成绩。如程涛平同志在武汉市政府部门工作,对武汉市的文化建设(如楚城的设想与设计,早殷遗址盘龙城开发)和经济建设,是很有建树的。这种直接造福于社会的工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

除了研究生教学,文献所还承担历史系本科生的《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教学,承担了十来门选修课,对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近年来不断增加。我们体会到,在市场经济时期,一个高校教师,绝对不能脱离教学第一线。只有过了教学关,才能充满活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科研是另一项主要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思路逐渐清晰,那就是科研力量要不断整合,形成自己的特色,科研要同博士点的建设,同重点学科的建设结合起来。作为高校中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导师,张舜徽先生又是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发起人、首任会长。文献所自建立之日起,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一个研究中心。1994年,历史文献学专业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这是一种压力,又是一种动力,促使研究人员拿出成果,促使研究所形成有特色的研究方向。20年来,研究人员各类著述已逾百部,论文逾千篇。尤其让我们欣喜的,是形成了三个研究方向,各自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

其一是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这是文献所赖以立足的基本方向,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上世纪80年代,较大的整理项目有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项目《张居正集校注》(张舜徽先生主持)和由古委会立项的《明实录类纂》(李国祥、杨昶二人主持)。前者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计4册260万字;后者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共21卷2000万字。还承担古委会“古代文史名著选译”6部,共200多万字。90年代初,承担国家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中篇幅

最大的《资治通鉴全译》，共 20 册 1000 余万字，这套丛书后来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90 年代中、后期，又承担了古委会项目《中国民俗元典注译丛书》（姚伟钧、杨昶二人主持，已出版）、《隋书新注》和《北史》、《魏书》的全译（都已按期完成，即将出版）。中国道教协会项目《中华新道藏》老学部分共 5 册，现已出版。近年来，又承担了古委会“皇清经解主题词索引”、“梁溪全集校注”、“太玄集义”、“旧五代史汇考”、“孝经整理研究史”、“翼雅丛编”等项目，有的已经完成，交付出版。另外，还有一些自选的项目已经出书。如刘韶军同志的《太玄集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周国林同志的《大唐西域记注释》由岳麓书社出版。总的看来，文献所的文献整理是以经史文献为主，与不少古籍所以文学古籍为主是不同的。

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李国祥先生主编的《古籍整理研究八种》、杨昶同志主编的《国学知识指要》、董恩林同志主编的《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先后挂靠文献所十多年，张舜徽、周国林师生二人先后担任会刊主编，共出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历史文献研究》13 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赞扬。对张舜徽学术思想和历史文献学成就的研究，最近也出版了一部专著和一批高质量的论文。

其二是传统文化研究。其中思想文化类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积累，较为突出的成果，有熊铁基先生的《秦汉文化志》，刘韶军同志的《儒家学习思想研究》、《楚地精魂——楚国的哲学》，姚伟钧同志的《中国传统饮食礼俗研究》。王玉德同志起初研究神秘文化，主编有《中国神秘文化书系》（10 册）。后来研究中华传统道德，又主编了《中华传统道德丛书》（10 册）；新近转向生态文化研究，与张全明同志合作主编了《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一书，并与马敏同志一道主编了《中国西部开发史》一书。此外，陈蔚松同志的《汉代考选制度》、吴琦同志的《漕运与中国社会》，也有相当部分涉及到思想文化。

其三是道家文献与文化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本来也属于思想文化的范围，但近十年来的成果已蔚为大观，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增长点，足以成为一个研究方向了。这些年陆续出版的有熊铁基等先生合著的《中国老学史》、《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专著有熊铁基先生的《秦汉新道家》，董恩林同志的《唐代老学：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国之道》、《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研究》，刘固盛同志的《宋元老学研究》、《宋元时期的老学和理学》等。即将出版的有《中国庄学史》、《日本老学史》等。

各类著述出版后，在学术界都引起了反响，有的还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奖励。如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中华人民通史》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李国祥等先生主编的《明实录类纂》获得

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著作类)荣誉奖;熊铁基等先生合著的《中国老学史》获得教育部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等等。其他二、三等奖和省市级奖励,还有十多项。

在科研活动中,同学术界的交往十分密切,大家以文会友,每年都有人参加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隋唐史学会、中国汉民族学会、中国近代史料学学会等学会组织的研讨会。尤其是每年参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年会筹备工作,结交了大批的学界同仁。同海外学术界的交往,也逐年增加。到欧美和日本进修讲学者近些年已有几十人次。到港台参加学术活动、讲学者,近几年没有间断。可以说文献所的学术渠道,是很畅通的。这对扩大文献所的学术影响,增强学术辐射力,大有助益。

### 三

以上的回顾极为简略,不过大致上可以显示出,20年来文献所的凝聚力是很强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勤奋工作,终于使文献所成为教育部古委会所属古籍所中的重要一员,使历史文献学专业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一个学科。我们可以自豪地说,20年的光阴没有虚度,我们无愧于迅猛发展的时代!现在,我们选编这本论文集,全部采用文献所研究人员、兼职教授和从文献所走出去的学者的文章,就是要让对文献所有着深厚感情的一个群体来共同纪念这值得珍视的20年。同时,也是这个群体向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的一份献礼。

在回顾、总结之际,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所在20年中,无论工作上,还是治学中,已经形成了我们的风格和特色。如果仿照时下以八个字加以概括的做法,我们选用的是刚健、笃实、博通、致远。刚健笃实四个字,出自《周易·大畜·彖传》。20年来我们艰苦奋斗,脚踏实地,是具备刚健笃实精神的。博通是张舜徽先生所提倡,为我们多数人所遵循的治学之路;致远就是志存高远,为有用之学,这是我们大家认同的治学目标。因此,这八个字虽然不一定能完全表述文献所的风格和特色,却是较为近之的。强调这八个字,对过往的20年是一种肯定、一种纪念,对今后的发展也不无激励的作用。取以名篇,意在于斯。

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中说:“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我们的事业方兴未艾,已经过去的20年,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衷心祝愿历史文献研究所的未来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作者李国祥、周国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 整理古籍与辨伪考信

吴量恺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文化光辉灿烂,遗留下大量的古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遗产。同时,历史上又存在着各种造伪或误伪的现象。老一代学者深有感受,他们认为,整理古籍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具有深厚的古代语言、文字的根底,娴悉声韵、训诂、版本、目录诸学,熟谙历史知识与名物制度、地理、掌故,长于经学和诸子百家之说,还要有广博的文学素养等,才具备从事此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何况,整理古籍名为整理,实为研究,不经过艰苦的考辨求证,探索研讨,是无法觅得其门径的;至于登堂入室,那就更要下一番苦功夫。只有孜孜不倦、顽强求索,才能取得创新之见。不努力研究,又怎么能取得成功呢?

整理古籍不仅要辨明一部书的真伪,而且要对书中所写的每件事、每个人、每种典章制度及语言文字等都应考究清楚,都要一一辨析明白。这就是说,古籍整理不仅是解题、标点、分段、校勘、注释、论说、今译等内容,而且还要辨伪考信,使经过整理的古籍成为学术研究可以凭借的资料,不致使人产生疑惑。所以,整理古籍是离不开辨伪考信的。

## 一、整理古籍必求其可信

整理古籍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社会提供过去存在的理论、思想和资料,提供符合实际的信息和可信的历史事实,提供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历代的政策、制度等,对这一切都要求真实可信。所以要考证核实,纠正伪误,要明辨是非,求是求实。

书籍是传播思想文化和历史的载体,要了解古代的思想文化、古代人物的活动与历史的变迁就不能不以书籍和出土文物为媒介,就不能不求之于我国流传几千年的甲骨、简策、帛书以及后来用纸张印刷的书籍,而其中有许多伪冒和阐

释不确切的古籍。因此清人崔述大声疾呼：“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往往议论纷纷，词调甚高，却不注意事实的真伪，结果造成大错。一旦事实有误，所阐明的得失岂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因此崔述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sup>[1]</sup>其主旨是先核清事实的真假，再进行得失与价值性的评论，这也体现出崔述求实的精神。因而在他的学术思想中，一贯着力于辨明是非真伪，求真求实。他说：“况于考信一录，取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sup>[2]</sup>并以此作为基点，即先把事实搞清楚再去评说，这样会更能接近于真实，分析会更准确恰当。考信是研究古史、整理古籍的前提，史实不清，材料不确，怎能明辨是非呢？无疑材料的真实性正是评论的基础。整理古籍的前提，就是要明辨真伪。王充曾说过：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沈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sup>[3]</sup>

这就是说，不可轻信古书与传闻，否则会失之偏颇，或为成见所囿，以错为正，视假为真，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会无所适从而无主见。甚至是非颠倒，以假为真，以真为假。显然，不辨真伪，就无法得古代典籍之真，只有先考证而后才能信用，才能明其真伪，定其是非。这种观念，清代的官员兼学者张之洞也是颇为赞同的。他说：“读古书宜分真伪。”他还认为，清朝的贤达士人撰写有“精明之书”，可以补前代的不足，可省很多精力，“前人是者证明之，误者辨析之，难者考出之，不可见之书采集之”。这固然可省些时间，但是对书之真伪、瑕瑜，仍需要认真地进行考信明辨。所以张之洞又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sup>[4]</sup>可见辨析真伪的重要。

古籍中的舛错讹误，造伪假冒现象很多，有的还很严重。造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大体上有两大类：一为有意造伪的，有的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有的为了争名夺利、升官发财的需要，有的为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需要，而故意造伪的。一为无意造伪的，由于学识根柢不够深博，而误信误伪的；由于学识不深，思考不周而信伪的；由于后世学者对待古籍不加以详察，以为汉晋学者采之入书的，一定是真实的。再后的学者不考其源流，不考其先世之所本，不辨其伪误，“遂信以为

真，而不悟者多矣。”对古书一概相信，而不辨明真伪，又怎能得其真实呢？

从历史上看，造成信伪、传伪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无此事、有此语，后人递演遂以为实事的。《春秋传》：“子太叔说：‘螾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后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后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忧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事者矣！”后人不加详考，就更信以为真有其事。崔述指出：“由是韩婴竞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如果经过冷静的思考，周密的考辨，就可以发现，“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如后人所云云也。”何况，战国游说的士人，他们可以毫无根据地凭心自造！不经过辨识，岂能尽信！决不能像后世读书士人那样，“但见汉人之书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所以在崔述撰写的《考信录》中，“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这也体现出了崔述坚持的不可轻信的精神，不能因其见于战国或秦汉时的书中就认定为是古代真实的事了，这样的轻信就会误听误信，甚至会真伪不分了。

其二，古语失其解，妄为臆说。古时日官称谓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帝尧的大臣羲仲、和仲主出纳日，故称为日御。后世失其说，遂误以为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还有误以御日为浴日的。故《山海经》云：“有始羲和，浴时于甘渊。”这二说均误，而且甚谬。古时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占为占验而非“占居”；仪古读如娥，故有常娥之称。以后又演化为后羿妻常娥窃长生药奔居于月中的传说。崔述据此认为：“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由于盲目相信成书时间早，又相信流传已久的记述，而愈传愈误，愈演愈“真”。此类的记述，实不可轻信。

其三，实事有流传日久而递变失实的，也有本非实事的。古代寓言颇多，“邪说”很盛，“汉儒误信而误载之”，“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这种事例，“在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也往往有之”。崔述列举了晋陶潜《桃花源记》为例，陶说：武陵渔人入山见居人自称先世避秦乱率妻子邑人来此，遂与外人隔绝。初无神仙诞妄之说。而唐韩愈《桃源图诗》则有“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刘梦得《桃源行》：“俗人毛骨惊仙子”，“仙家一出寻无纵”。这都把桃花源与神仙联系起来，加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与原文之意大有不同。

这都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递演递变越来越变型了。这样就会出现人云亦云的，人错己错的现象。所以，对待古史、古事和古书的态度，不可盲目信从，不能轻信，一定要先考证辨识，然后才能判定信与不信。

## 二、考而后信

整理古籍对前人和前世之书要进行审视考索不可轻信，更不能盲目相信。崔述指出：“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它，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sup>[5]</sup>前人之言和古书中的伪误是很多的，刘知几在《史通》中就指出：

“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此《五经》指《公羊》、《谷梁》、《礼记》之文，非古经也），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韩氏攻赵（按《史记》攻赵者屠岸贾，非韩氏，此文盖误），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鲁侯御宋得俊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遇，唯在 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覘其哭于阳门（原注，出《礼记》）。……其记时也：盖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昭夫人（原注，出《列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王葬马（原注，出《史记·滑稽列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原注，出刘向《世略》）；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栾书仕于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伸诚（原注，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曾无所疑。”<sup>[6]</sup>

这都是秦汉时人记述春秋战国时事，反而讹误如此。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可惜！缺少像刘知几这样肯于详考而精辨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揭出事情的真相。还只是春秋战国时事，若再往前推，虞夏商周多为几千百年以前的事，“则其舛误乖刺则必更加于春秋之世数可知也”！“岂得遂信以为实乎”！因而对古书、古史都不可轻信，要考而辨之，确切无疑时始可相信，才可称为信史、真书。

就是近世人记近世之事，亦有不实的“浅妄之书”。正如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所言：“俗间所传浅妄之书，所谓《云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现举数例以见其荒谬的说法。其一云：“姚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



召’。按(姚)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已三人辅矣。”已三次为相的人,怎么还说他是步辇之召呢?怎么能称他还是翰林学士呢?实在是荒唐。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说得极为真切,但与史实相差太远。“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无论如何张嘉贞也不会找个已死的人做女婿的,这是太荒谬的说法。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惟张九龄未尝及门。’”而实际情况是,“按张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sup>[7]</sup>这与历史实际相差极大,如以此为真实,岂不歪曲了历史!由此可见,虽近世之书述前数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尽信的;况于战国、秦汉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误应更多,甚至有百倍于此的。

整理古籍不能盲从,更不能人云亦云,这样会造成大错的。《史记·乐毅传》中的记述:“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惟独莒、即墨未服。”传中记载的本很清楚,是乐毅自燕王归国后,留在齐地五年,日攻齐国,共克七十余城,惟独莒、即墨二城未攻下。《史记》原本记载得很清楚,“此本常事,无足异者”。而后来却有了多种说法,使人更加困惑。说法之一,夏侯玄认为,乐毅攻下七十余城之后,停兵五年未进攻齐国,“欲以仁义服之,以此为毅之贤”。说法之二,苏辙认为,“乐毅不当以仁义服齐,辍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尽弃,以此为毅之罪”。说法之三,方正学认为,乐毅起初并不想“以仁义服齐”,于是攻下七十余城,以后“恃胜而骄”,“是屯兵两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sup>[8]</sup>这些论断似乎都有道理,但是皆与乐毅无关,乐毅既未以仁义服齐,又未辍兵不攻,更未恃胜而骄,他未曾这样做过。所以要辨清事实,要以事实为准。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有枝添叶、画蛇添足<sup>[9]</sup>,尽情地演绎推想,这就会离事实越来越远了。

孔子被围于陈蔡间,在陈绝粮事,厄于陈等,在多种书中有记述,也留有种种传说。事实究竟是怎样呢?崔述对事实进行了严谨周密的考辨研究,得出了与众说不同的认识。《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说:“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孔子讲诵弦歌不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崔述认为,“此说世多信之,余窃疑焉。不能人云云遂云云”。

首先,他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时指出:“陈、蔡之畏楚久矣”,楚是大国强国,而陈、蔡是小国弱国。当时吴兵正在陈国城下,“陈旦夕不保,陈方引领以待楚救”,陈竟然与蔡合谋去围攻楚欲聘请的贤达孔丘。这样做会激发楚人之怒火,